

罗继祖 著

庭闻忆略

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

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庭 闻 忆 略
长春文史资料第十辑
罗继祖 著

*

长春市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75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125 折页16 字数150,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书内1,155字 定价 1.90元

（内部发行）

导言

王庆祥

继祖先生是我的老师，可是我与先生最初的晤面竟是在浩劫袭来的日子里。当时，罗老已被划入牛鬼蛇神之列。目睹罗老挨斗时摇摇晃晃的样子，我感到揪心和不忍。多年以来罗老把妻儿老小放在大连，孤身一人前来长春任教授，书斋、讲席之外足不他涉，忠厚正直，人所共知，何为而如此遭受磨难？

由于长期以来生活上无人照料，罗老的身体很不好，然而却有一付很硬的骨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系内专门管理“牛棚”人员的“政管小组”让罗老和其他“牛鬼蛇神”一样写“反省日记”，罗老就写了一段他对当时胡批乱斗的看法，大意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历史条件，首先是时间、地点。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写新民主主义革命高涨时期的情形，那时斗争土豪劣绅才采用戴高帽游街的办法。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取得胜利，建国都十多年了，连地主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却叫我们戴高帽子，请问我们的土地在哪儿？可想而知，这篇“反省日记”在当时不能不闯下大祸，然而那些手拎皮鞭的“红色造反者”也无言以对，唯有蛮不讲理地对罗老加重迫害。

一九六八年九月，罗老和吉林大学内数以百计的“牛鬼蛇神”被集中关押在数学楼期间，我又目睹了一幕惨剧：“占领上层建筑”的宣传队队员“兵临城下”，迫令“老九”投降。有一个家伙指名让罗老高声朗诵毛选四卷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该文章

一句话即说“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显然，这种比拟实在不伦不类，罗老据理争辩说，论起向共产党投降，他比杜聿明早得多。从历史的角度看，毛主席敦促杜聿明投降的时候，他早已是革命营垒中的一员了。罗老这一实事求是的客观说明，却激怒了执掌学校大权的宣传队，他们象是发现了“敌情”，立即组织力量群起围攻，端出了“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战斗姿态，对罗老兼用文武，其余也不问可知了。

文革前我和罗老并无接触，却存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我从一九六三年秋季进入吉大历史系读书不久，就陆续听到不少关于罗老的故事，大抵说罗老是一位承继家学的才子，诗文书画无所不通，在我系还有三大弟子。受到一种强烈的读书欲望的驱使，我真想立刻去敲开罗老的书斋之门，请他收留我这个新弟子。也许是我的想法过早地流露出来了，又被好事者作成了汇报材料，反正“政治辅导员”及时找我谈了话，希望我“不要拜倒在专家、学者脚下”，而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结果，我的拜师计划耽搁了下来。这时罗老已奉调进京校点《宋史》，更无由与先生相识了。现在想起这事还颇为懊悔：罗老的三大弟子而今有青年红学家，有杂志主编，也有出版界著名活动家，可我却失去了一段求学受业的美好时光……

在文革的最初年代，我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本不属于“打倒”或“横扫”的对象，只因表现了对极“左”那一套的不满和厌恶，而被冠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推入被打击的行列。由此却得到机会与关在“牛棚”中的学者、专家们建立了友谊，我负责给他们采买烟、茶、肥皂等日用品，并与家属联系取送换洗的衣服，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和罗老、于老（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等建立起共患难的忘年之交。

罗老在文革期间身受污辱而表现出凛然不屈之态，令人油然

而生敬意。事实上罗老治学数十年，忠厚正直一身清白，本也无懈可击，到一九六九年初，刚提出所谓“落实政策”，历史系便第一个解放了罗老。

二

罗老名继祖，字奉高，后改字甘孺。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三日生于日本京都市净土寺町字马场八番地的罗氏侨寓，当时正是辛亥革命之后，罗振玉弃官而携全家避地异域。

罗老从小就读于祖父书案之前，五岁起识字，整个青少年时代并没有离开自家书房，熟读过的经书典籍，四书五经外，计有《前四史》、《资治通鉴》、《周礼》、《大戴礼记》、《亭林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切问斋文钞》、《东华录》、《国朝先正事略》等。

由于广泛涉猎，罗老的学业迅速及于文学、史学、考古、目录、版本、诗词、绘画、书法等各个领域，建立起深厚的基础。

当时，国内史学界有个“古史辨”派勃然兴起，年轻的继祖先生显然也受到它的影响。罗老喜读《左传》，却怀疑书中那些生动的细节描写有没有历史根据。由疑古而兴著述之志，第一部习作便围绕着考证春秋时代的异地同名问题写出来了。罗老从此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罗老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

对于家学我是有心继承的，惟对古文字学不感兴趣，而对于祖父平日所搞的考证却有偏嗜。祖父在学问上开的门路很广，特别是人家都不注意的，他注意。最先是敦煌卷轴，接着是殷墟甲骨、西陲简牍、大库史料。而牵涉他精力最多的是辑录金石遗文，毕生未竟。他一生为学不出这个圈子，而在方法上大体以乾嘉考据学为依归，我对此只能是望洋向若，只想勉力继承他的一部份，就是史学。因为上述种种归根究底离不开历史，如不具备历史常识和其他辅助科目的知

识，几乎无可下手。

罗老由治史进而升堂入室，走上专治辽史的道路。《辽史》是二十四史中问题较大的一部史书，其中错漏甚多。长期以来就有人志在对其订误正谬，惜无缘以成。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辽人墓志大量出土，时机成熟，罗振玉即嘱其孙以辽代出土文物校核《辽史》，继祖先生由是缘起费时两年，写成《辽史校勘记》，凡八卷。该书于三十年代末石印问世，一九五八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在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辽史研究方面，罗老还先后发表了《辽史译文异同表》、《辽方镇年表》、《辽史与研究辽史的资料》、《辽代经济状况及其赋税制度简述》等数十篇论文。

作为学者，承继家学固然是有利因素，而从罗老的身世看，也有不利因素。

罗老靠家学成才，然社会已经大变，又不能不为生活出路计，总得在社会履历栏内填点儿什么。于是，由罗振玉出面先为长孙谋得满日文化协会东方国民文库编辑职务，继而借助旧交黑田源次博士的关系，使之转任满洲医科大学预科国文讲师，是年继祖先生方二十七岁。两年后又转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任讲师，那几年教书生活还算安定，课余之间出入于东方文化研究所，借助那里的十分丰富的汉文藏书继续研究辽史。到一九四三年暑假，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京都也时有美机临顶，继祖先生便乘机辞职离开了日本。回国后罗老又在康德印书馆担任了几个月的闲职，就出现了八一五光复的政治新局面。

当年冬天，罗老冒险返回旅顺，不久赶上从延安来的共产党的干部请他出面整理罗家藏书，以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罗老慨然应允，从此投身革命，成为人民政府教育局的一名科员。当时旅顺市内有个已废的娘娘庙，便当作临时整理处，后又迁

到大连南山的两座废佛寺内，罗老整理图书直到一九四八年。这以后，罗老先调入沈阳博物馆任研究员，继而奉派参与接收大连的原满铁图书馆，其后留在旅大市图书馆参考研究部，直到一九五五年四月应聘转任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席，至今已满三十个春秋了。

文革前，罗老先后开了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选和辽史选修课等课程，受到系内师生的好评。一九六四年秋天因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推荐，赴中华书局校点《宋史》，这项工作由于文革的突发而告中止，届时已完成本纪、表和部份列传的校点工作。

在漫长的文革年代里，罗老既不附会影射史学的陈词滥调，也没有就此辍笔，他博览勤记，写下大量读书笔记，这就是去年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的《枫窗胜语》一书。该书凡十六万余字，内容分史札、尚论、表微、文物（上、下）、东北史丛话和杂俎六项，二百余篇，短则百字，长可千言，正如于省吾教授生前所评，文章虽短却比洋洋大文更解决问题。罗老撰写这批读书笔记的背景，也足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短小篇章何以能给读者高人一筹的启示，下面是罗老自述：

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各种刊物虽复活，我却未发表过一篇稿子，有功夫尽量写我的读史随笔——《枫窗胜语》。我写随笔导源于张丛碧（伯驹）的《春游琐谈》。它已成为文革中的一段小小插曲。别有用心的硬在“春游”下加个“社”字，把它说成是一个反党的秘密结社，《琐谈》就是反党纲领。学校保卫部门为此动员侦察多日，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一九八二年初丛碧逝世，我寄挽联，下联“才名盖代，春游几卷续乌台”即指此。现在《胜语》辑录成书，不久可望出版，它是我十年浩劫中的唯一纪念品。

今天，罗老的《枫窗胜语》已经问世；丛碧先生所编的《春游琐谈》也出版了，其中收录罗老的随笔数十篇，文如其人，读者可以想见治学锲而不舍、知识广博而见解高深的一代学人。

近年来，罗老还带了一期东北地方史专业研究生。

当晚境悄然降临的时刻，罗老治学更勤奋了。我每次去访，老人家总要拿出新的文稿或一批新的研究题目让我看，我不禁深深折服。罗老的为人和学识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现在，罗老是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学术委员会委员、省历史学会理事、考古学会理事、全国书法协会会员、省书协分会名誉理事、省图书馆会刊丛书顾问、武汉中国文献学研究会会员兼学术委员。同时，作为九三学社的成员，罗老还被推选为长春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三

罗老为什么要写这部《庭闻忆略》呢？

一九八〇年十月，罗老以“甘孺”署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一书。后来，罗老在自传中曾谈到撰写此书的动机，他说：

祖父为了效忠清室而逃亡国外，后来又死抱着清室末代皇帝溥仪不放，硬要捧他出来复辟大清，这是逆世界潮流的行动。正象谢刚主丈（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引者注）在《行年录》序里说的那样。我是他的孙子也不能稍为他辩护和隐讳。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他的事迹比较多，因为他和溥仪的关系容易取得大多数人相信。实则溥仪这本书，他所亲身经历而目击的能如实反映；听人传说的却多诬妄失真，未经调研便写在书里了。涉及祖父的出身略历，书中即作了极大歪曲。因为溥仪小朝廷里党派甚多，祖父当年正是

各派攻击的目标，溥仪听到许多谰言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谢序说得对。祖父一生人所共见，他最大的错误是认敌为友，充其量至于祸国殃民。但平心而论，他和同时某些人还多少有区别，有的本身就是政客，为肥自己身家遂悍然不顾，他则受旧的传统思想锢蔽太深，一意孤行，只知忠君而无视世界潮流向背，正好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圈套而不自知，晚年虽在某些事实上促使他有些觉悟，但已无法挽回，赍恨没世。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尽我最大可能，为后人论定贡献素材，里面有辩驳无批判，或略加提示，因为批判是大家的事。不过，我所掌握的材料并不完备，或者主观成分多，也欢迎读者能予指正补充。

然而罗老这部《行年录》系用文言写就，且受到“年谱”这种体裁的局限，致使罗老的本意未能充分发挥，尤其有许多重要资料也没能写进去，罗老感到这项工作还必须由自己完成，于是又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条辩”文章，逐条反驳《我的前半生》一书中的失实之处。因为我是研究溥仪的，罗老的文章写出后就交给我看，希望听听意见。我看过后又和《长春文史资料》编者林宜同志讨论了一次，我们认为罗老的文章涉及我国一代学术大师罗振玉先生的许多重要史事，很有价值。但是，以“条辩”的写法不免把本来连贯的事迹割裂开来，且因受到某一部书的牵制，又有喧宾夺主之嫌，遂建议罗老改写，从回忆的角度放笔写出祖父的一生。罗老表示赞同，并为此花费了半年时间，写出了这部《庭闻忆略》。

罗老写自己的祖父，亲闻亲见亲身感受，当然是最有条件的。关于罗老与其祖父间非一般的长、晚辈关系，我们不仅能从罗振玉给孙儿的取名上看得出来，也能从继祖先生的自传里找到生动的记述。他写道：

我是长孙，特别受到祖父怜爱。两周岁后就被祖母丁太淑人抱来，直到长大和祖父母同生活。我幼时体弱多病，祖父对于育婴颇有经验，因此对我的饮食十分操心，常说小孩胃口弱，“第一要注意饮食。我五岁开始识字，每天识生字八个，积累到一、两千。这时祖父正在研究甲骨文，因为教我认字，索性把他已辨认出来的甲骨文也写成方块教给我，他多么想我长大能继承他，谁知我于古文字学根本就不感兴趣，未免辜负他的期望了。记得有一次他指着甲骨文问我，你认为我是爱你还是爱甲骨？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爱甲骨。他半嗔半喜地说，你这孩子太没良心了。

祖父不但是继祖先生的识字老师，也是他的启蒙者，曾亲授《桃花源记》以及唐人五、七言绝句等。发现继祖先生的学业有所长进就欣喜异常，如继祖先生少时读《三国演义》，自制了一份三国人物表，却把汉献帝的臣下单独列出，不与曹魏之人相混，由此得到祖父赞赏，以为孺子尚知“汉贼不两立”，逢人便说，十分欣慰。待继祖先生年岁稍长，又由祖父开列阅读书目、拟定研究题目，连确定辽史为攻读方向也是祖父选择的。数十年耳鬓厮磨使继祖先生对其祖父的经历、性情和思想，有任何人都无可代替的了解。

罗老写自己的祖父，不替亲者讳，他的观点是“主要说真话，不说假话”。我以为《庭闻忆略》正是罗老“说真话”的实践。有一次，我和罗老讨论这篇文章，他说了一段很中肯的话。

我写这篇回忆录就是要说老实话，比如我们罗家子弟小时候不入学堂，这是什么原因呢？有的亲属讲，因为在国外，环境不许可。其实，只是祖父造成。他在家族内搞家长制、一言堂。清朝时他也主张办学，但辛亥革命后不办了，认为学校培养了一批反叛朝廷的学生，因此再也不让我们到

学堂去。回忆祖父，我就要说明这些真实的情况。

罗老治学数十年，为人正直、忠厚，其态度是非常可取的。

由罗老回忆并撰写其祖父罗振玉的一生史事，这也是海内外学术界长期所期待的。对此，通过罗老的海外通讯，我们能够窥知一二。就拿现在与罗老仍保持联系的几位专门研究王国维的海外学者来说吧，他们得知罗老回忆祖父的宏文将在文史资料上刊出的消息后，立即来信询问：“您的回忆录是否已完成？如已登载，可否示下出处，以便拜读。”“您的回忆录将在何处文史资料发表，便中尚请告知。”

留美学者杨君实看过罗老的《行年录》，以及王国维之女王东明的回忆文章后，感到关于王国维之死的疑案可以有个定论了，他在致罗老的信中兴奋地写道：

东明女士所述家庭误会，同先生《行年录》所述，其实并无舛格，为母辩护，亦属人情之常，外人无需再置喙。事态发展至今，至少从两方面澄清了历来外间流传所谓“逼债”等调言。

这里谈到“东明女士”的回忆文章是指发表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八日台湾《联合报》上的《最是人间留不住》一文，东明女士在文中回忆了她父亲王国维于一九二七年自沉昆明湖前后的情形。名重士林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之死曾在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他本有遗嘱，清楚地说明自己为“世变”“殉节”，可是偏有一些对王先生的厚爱者，一定要遮盖他头上那根遗老的长辫，把他扮成超然于政治的学者，这中间不乏学界名流如马衡、顾颉刚等；更有甚者利用王国维、罗振玉“失欢”等家庭误会横生枝节，造出所谓“逼债”、“扣吞画款”等无稽之谈。尤其是这些谣言被郭沫若、溥仪等轻信后加以传播，自然也就“声势浩大”了。然而，事实毕竟不能永远被掩埋住。东明女士和罗老以知情

人的身份披露了“家庭误会”的真情，而罗老的《庭闻忆略》以更丰富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王国维以“自沉”之举、行“尸谏”之义，为溥仪尽忠的一段信史。

由于这些，海内外学人期待于罗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杨君实先生致罗老的信中还写道：

海外对于国内学术界的消息相当隔阂，尚无机会拜读您关于王国维政治思想的大作。如您不反对，我打算把您的大札，交港台报刊发表，不知您是否同意？

在这里，我愿意再向读者介绍一位与罗老书信往来的美国学者，他叫沈怡（Joeh Bonner），正在撰写一本王国维先生的学术传记。他在致罗老的信中介绍了他这本尚未问世的著作的内容，其中特别谈到：

……我所作的学术传记，不仅涉及王国维先生极深，同时也与先祖父罗振玉先生息息相关。我希望我的《MaHiers of Prin cipu》（原书题名）能够直接地记载出罗振玉先生的平生特质，尤其是他与王国维先生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您的大作《永丰乡人行年录》及《跋〈观堂书札〉》。

由于上述理由，沈怡先生特别希望能够与罗老进行学术交流，从而得到罗老的帮助。在同一信中他开头就以流利的中文热情地写道：

不久前拜读了您的《跋〈观堂书札〉》和《王国维先生笔下的哈同仓圣明智大学》，对您文中所持的精辟见解非常钦羨，而最近又着手研读您所发表的《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更讶异于您对先祖父罗振玉先生之生平资料搜罗得如此详密。目前，我所做的学术研究便涉及先祖父罗振玉先生及其学生王国维先生，我真切地祈望您能拨冗和我这个研究了十八年中文，对清末民初历史有特别兴趣的美国人以书

信结缘。

这位有成就的美国学者在信中表示，“有朝一日能得缘与那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之嫡孙通信”，他“真心地感谢”罗老“这几年来发表了许多涉及王国维先生及罗振玉先生之作品”。

海内外学者对罗老的期待证明，罗老对祖父的回忆文章肯定具有重要价值，将对解决若干历史疑案发挥作用。

四

罗老回忆祖父的《庭闻忆略》必将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这是罗振玉先生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

罗振玉出生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镇压以后的一八六六年，在慈禧垂帘的最反动的年代里长大。他所身系的家庭则是累世衣食朝廷俸禄的官宦人家。社会和家庭影响着青少年时代的罗振玉，使他成为最虔诚的皇权卫道者。

罗振玉在学问方面的深厚的根底也是在少小时代就奠定了的。他五岁入塾读毛诗，十二岁读唐宋诗词，十五岁遍读诸经，十六岁始助理家政，同时精读《皇清经解》一书。十九岁时罗振玉的处女作《读碑小笺》刊行问世，同年，《存拙斋札疏》亦成书，由时年已八十六岁的名儒汪士铎为序，著名考据学者俞樾也曾在著作中引录罗振玉的论述，说明他在治学方面已趋成熟。

步入社会以后罗振玉面临的现实正是濒临崩溃的“大清帝国”，康有为领导的改良变法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各自燃点起熊熊的烈火。作为皇权主义的卫道士，罗振玉对前者有点同情，对后者则坚决反对。清朝灭亡前他效忠朝廷，辛亥革命后他甘当遗老，在溥仪图谋复辟的年代里他追随左右，最后随溥仪一起陷入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布置的泥潭之中，这是历史的悲剧，一个逆时而动的人必然得到的下场。

罗振玉的履历如下。他十六岁中秀才后又曾两次应乡试考举人均不第，于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走上另一条道路。时为一八九六年，罗振玉在上海创立“学农社”，设“农报馆”。取得相当成就，引起当局注意，于一九〇〇年秋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电邀赴武昌主持农务局并兼农校监督；一九〇一年又主持武昌江楚编译局，并首赴日本考察教育；一九〇二年受聘于盛宣怀任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监督；一九〇三年又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一九〇六年应召进京，出任清政府内专管教育和考试的学部参事厅行走，后升为参事官；辛亥革命时应日本京都大学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教授之邀，携家移居日本京都，一住八载，潜心著述；一九一九年返国寓居天津，蔡元培邀就北京大学考古学讲席，不应，却追随尚留紫禁城内（后迁往天津张园）的小朝廷，为旧主溥仪效劳；一九二一年曾主持北京城内旗人的赈灾事务，为此还招集商股设立东华银行，又在天津开设博爱工厂，自认为是为“大清”服务；一九二九年移居旅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罗振玉怀着恢复“大清帝国”主权的愿望与日本磋商并参与劝说溥仪出关；一九三二年参与伪满“建国”，初授伪参议府参议，不就，又授临时赈务督办亦未就，只随侍溥仪左右；一九三三年六月出任伪监察院院长，十月出任满日文化协会常任理事；一九三六年出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一九三七年三月辞官获准，返旅顺寓所闭门著书；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四日因风寒转肺炎而去世，卒年七十五岁。

罗振玉参与了伪满的傀儡政权，从而成为政治上的民族罪人，这是已经铸就的历史事实。他走上这条道路是政治立场所致。他是“大清帝国”的虔诚信徒，对末代皇帝溥仪又充满了幻想，认为溥仪才是唯一能够救民水火的圣明贤君，可为之赴汤蹈火，虽死不辞；至于溥仪以外的政治势力，无论北洋军阀，还是

国民党、共产党，一概不合作。这样，为了复辟这个政治目标而向帝国主义势力寻求支持就成了唯一的出路。日本，可以说在历史上就与罗振玉有点儿缘份，从一八九八年创办“东文学社”就广泛接触了日本学者，后来两番东渡，数载侨居，结识了大批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各界人士。在这种情势下产生某种偏见是很自然的，以至于把日本的正直学者与黠武军人也混同起来，竟相信法西斯分子会给予他的旧主以“大清帝国”的主权。于是这批可怜的清室君臣一起上当：他们本想利用日本势力恢复大清的江山，结果却被日本利用，成了被牵动着的十分蹩脚的木偶戏演员。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以，即便是罗振玉的嫡孙和爱孙继祖先生，也并不谅解自己祖父那一段悲剧性的历史；然而，我们决不因此而埋没罗振玉先生对我国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辉煌贡献。这正如我们并不因为溥仪有几十年罪恶的前半生，就否定他还有八年光荣的后半生一样。

罗振玉是我国最早的几位甲骨文学者之一，经他释出的甲骨文字最多且大部是正确的，他和王国维共同创立的研究方法为我国甲骨学的发展开了路奠基了基；罗振玉继承宋代以来学者对金石文字的研究，开辟了古器物学研究的新阶段，扩大了研究领域。他最早整理了出土于一九二二年的汉代灵帝熹平年间立在洛阳太学门外之石经上的残字，他也是我国最早整理出土于一九〇八年的一批汉晋木简的学者。他又千方百计地刊印传布了已被帝国主义分子窃走的甘肃敦煌千佛洞藏书库中最精华的卷子本古书和佛经等。这种传古精神和爱国行为值得敬重；罗振玉两度挺身而出，不惜自身破产，保存内阁大库的档案，使数以万卷计的重要史料免于焚毁，可谓立下了不朽功勋；罗振玉还直接、间接地培养、造就了一批人才，以《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观堂集

林》等著作而驰名近代学界的王国维先生，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有那一项不与罗振玉先生息息相关呢！

罗振玉先生的学术功绩还不止于此，早在清朝末年，他主持编辑的七集《农学丛书》，包括二百三十余种译著，在本世纪初年发明石印后对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科学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杨直民同志在《中国传统农学与实验农学的重要交汇》（载《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一文中公允地评价了罗振玉的功绩。他写道：

在近世中国农技史有关问题的探讨中，罗振玉在农学方面的活动是不能不略予提及的。董作宾为罗振玉撰写传略，说罗振玉毕生殚力治学，著述等事。在学术贡献最大的事项上提到五条，一是内阁大库明清史料的保存；二是甲骨文字的考订与传播；三是敦煌文卷的整理；四是汉晋木简的研究；五是古明器研究的倡导。实际上，罗振玉在兴办农学会、主编《农学报》、著述编辑农书、兴建农科大学堂，在中国参与开拓现代农学，其业绩与上述五项，是不相上下的。

看来，对罗振玉的评价自有公论。早在罗先生活着的时候，郭沫若曾著文痛骂他反动的政治立场，甚至轻信谣言，说罗氏在王国维的著作上署自己的名字，又向王“逼债”等等，总之罗在郭沫若笔下“卑劣无耻”。然而，与此同时，郭沫若依然高度评价罗对我国学术事业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写道：

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满清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

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于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还有他关于金石

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其大的财力才能办到的。

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可见，用“两分法”公允地评价罗振玉，郭沫若早已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于长春南湖新村